

近代史研究

JINDAI SHI
YANJIU

1988 6

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嬗变轨迹的新探寻

——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研究述评

姜义华

1912年至1949年中国思想文化的新旧嬗替，是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五千年未有巨变的继续与深化，是经济、政治、社会大变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这段历史很少有人问津。问题自身的复杂与曲折使人望而却步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缺乏对这些同当代关系特别密切因而特别敏感的课题进行严肃的科学探究的适宜环境。可喜的是，近十年来，这一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不仅在我国大陆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台湾，在香港，在海外华人华裔学者中，也涌现了不少不容忽视的研究论文及著述。全面地述评或许需要写上一部专著，这里只能择要作一点介绍，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基本架构与主要轴线

如何从总体上来把握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赓续与嬗变？这些年中间世的绝大多数著述，立论都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突出了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的进攻，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研究现代政治思想史两部著作《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陈旭麓主

编)如此,研究现代中国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及现代中国各方面文化发展的著作,也大多如此。林茂生等主编的达42万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共七章,内容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理论和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他各派的政治主张;蒋介石集团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工农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及其他各派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抗战主张;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阐述,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系统化;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在建国问题上的主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胜利。篇幅达56万字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共五编,内容为: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与三民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尖锐对立及各政派;全民族抗战思想的确立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两部书的结构与基本论旨,比较具体地再现了《新民主主义论》所钩画的思想文化运动演进的轮廓。

另有一些著作,在概括现代中国思想运动时,采取了更为简捷的两分法。吕希晨、王育民编《中国现代哲学史》和张锡勤等编《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便是其代表。《中国现代哲学史》共三编,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输入;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形成及其同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胜利发展与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彻底破产。《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现代部分三章,分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急进民主派所倡导的道德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主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这两部著作相同之处,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一营垒,以地主资产阶级为一营垒,以这两个营垒的争衡概括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

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大量论文与著作，凡是依托于这两个总体系者，尽管在一个个具体论断上，彼此之间各有虚与实、宽与严、浅与深、疏与密等等区别，但在价值判断的标准、观察问题的角度、材料取舍与思维方式上，则明显地表现了一种共同的趋向。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一总架构及它所钩画的主要轴线，长处是能够大体按照民国以来思想家、文化人的主观认识，再现他们为之献身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外部面貌。短处是缺乏一个更高的视点，缺乏一种对于先前历史运动严肃的检讨或批判的精神，不能从较为宏观及较为深层的角度深化对于民国以来思想文化运动的认识。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与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相对垒这一架构及它所钩画的主要轴线，没有拘泥于前代人对于自身的认识水准，但是，它所依循的批判基准，强烈地表现了建国以来长期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斗争对于历史认识的影响，这一批判基准本身就具有严重的主观随意性。这些弱点不能不影响到这些研究论著的总水准。

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现代化建设日益成为中国现实生活的主题，一部分学者尝试着提出了一种新的架构，这就是按照中国走向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曲折进程，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洗汰、更新与嬗替，研究西方思想、西方文化包括苏联的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变形与融解、发酵，研究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孕育、难产与困顿中的成长。这些年来，相当一批硕士与博士论文，《走向未来丛书》及其他许多丛书中相当一批著作，都是按照这一新的架构与轴线来从各个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对民国时期思想文化进行剖析。

港、台与海外学者中，按照这一架构来研究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历史者，也不乏其人。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所著《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从传统到现代》等，便是其中一个代表。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文化中国丛书》。它由周阳山等一

批青年学者编辑，原计划分作八辑：第一辑《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第二辑《中国现代化的前瞻》，就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提出理论性与经验性的批判，并从不同学科的观点出发，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予以整体性的检讨；第三辑《民主与中国》，分别从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角度检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不出民主的原因，就民国以来民主制度的发展、宪政制度的沿革、政治文化的面貌等加以析论；第四辑《五四与中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专门的广泛讨论；第五辑《知识分子与中国》，检讨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特征和使命；第六辑《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就晚清以来各思想家、各种主义的倡导者、文化界代表人物分别进行研讨；第七辑《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就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症结、儒家的近代命运、中国文化的前途作广泛的检视；第八辑《西方学者论中国》，介绍和评述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这是一部汇集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精粹的大型论文集。我所见到的有《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一册，《五四与中国》一册，《知识分子与中国》一册，《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五册，《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文化传统的重建”、“当代研究与趋向”两册，其他各册不知最近是否已出版。周阳山为这套丛书所写的代跋《文化中国的漫漫天涯路》中说，我们生成于既存的传统之中，传统相当程度地规范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与文化经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或五四以来传统价值与结构全盘衰微解体，但并非一去不复返，，不仅大众文化层面中存续着许多传统价值，而且在精微文化层面中，在滋生型塑的许多“新传统”中，诸如整体论与一元论的思考模式、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泛政治主义、泛道德主义等，都可明显地溯源于旧传统之中。为此，文章作者主张：“从根源上反省观念意识的背景与基础，从方法上检视思考的论证过程，以及从内涵上拓植思想理路的深度与广度”，立基于世界学术的水平，严格

究竟地分析当代的中国文化问题，以超越传统所规范的思维模式，进而谋求与当代知识成果及智慧结晶的契合，以创获一新的文化内涵。这一段话，可以视作他们所建立的这一架构的主要支撑点。

在缔造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研究新的基本架构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两部专著，我以为一是美国学者维勒·史华慈的《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遗产》，一是中国学者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前一部著作出版于1986年，以启蒙与爱国、启蒙与政治的冲突来展开他的研究；后一部著作出版于1987年，以启蒙与救亡的冲突来展开他的研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研究中国启蒙的历程及其间的种种挫折与困扰，并以此作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发展的主轴。

史华慈《中国的启蒙》根据康德的观点，将“启蒙”定义为从不成熟的依附状态中挣脱出来，达到自觉以及不需要外来权威主宰的“自立”状态。他认为，在西方，近代以科学革命为基础，藉助理性批判的精神将人从基督教神学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中国则不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启蒙的任务，却缺乏科学革命的基础。中国的启蒙者企图输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推进启蒙运动的开展，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是异常坚韧的家族与政治的权威，他们又身处严重的民族危机及由这一危机激起的政治运动风暴之中，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暴力与反帝动员的旋涡，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地将他们卷离了“启蒙者”的宝座，也使“启蒙”直到今天仍然是个未竟之业。

李泽厚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虽然是文化，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是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是，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抛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它仍然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主线。启蒙与救亡当时曾互相促进，可是，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

势很快压倒了一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并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于是封建主义乘机复活。由于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终于导致巨大的苦果。

在现代化曲折进程中传统文化瓦解与嬗替,中外文化撞击与交融,以及启蒙受制于政治暴力与反帝动员,或启蒙受制于救亡(革命),这样两种架构虽然也很注意文化同政治的关系,但都不再简单地将文化变迁视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物,而将视点移到文化及思想自身的运动与变化。这两种架构比之先前两种架构,更有利于超越当事人原先直接动机、表层意识,从较深的层次去剖析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纷争与变动。这两种新的架构都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有价值的论点,有助于推进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但仔细推敲一下,便可发现,这两种架构及其主要结论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从法国、德国、美国及日本等许多国家及地区近代启蒙运动史可以看出,救亡、革命、政治暴力、战争同启蒙并不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在那里,大多数场合,前者恰好促进了启蒙的发展。因之,将中国启蒙运动的中辍、未竟归之于救亡、革命、政治暴力及战争频仍,说服力未免不足。史华慈与李泽厚所建立的架构同现代化论者所建立的架构,忽略了一个最主要的事实,这就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大变动,首先是一场农村大变动,这场农村大变动的勃兴,又主要根植于中国小农社会自身矛盾的积累、积聚及爆发。席卷南部中国的太平天国,席卷江淮地区的捻军起义,接着是北方陆续爆发的反洋教斗争,后来聚合的席卷华北与东北的义和团运动;其后,除去一部分饥民暴动外,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进入了军队,成了军

阀混战的工具；二十年代以后，农民战争再一次在南部中国燃起熊熊烈火，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重心又转移到北部中国，这一阶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现代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历史上，小农社会随着土地集中、人口膨胀、统治者消费欲扩大及剥削量急剧增加，周期性地爆发过多次与此相类似的农民战争。这一场场农民战争，农民的基本要求仍然是土地细分化，保障他们自给自足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生产。帝国主义入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给这场农民战争增加了不少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特异色彩。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农民奋起反帝救亡，抗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他们的威胁，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他们已经持续了漫长岁月的原先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现代中国的救亡运动、政治暴力、革命战争之所以常常会挤压了启蒙运动，正是因为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救亡，是适合于农民要求的政治，是首先满足农民要求的战争，而不是欧、美那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救亡、政治暴力、革命与战争。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提出了使人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启蒙任务，然而，农民运动、农民战争，所强化了恰好是传统的小生产观念、自然经济观念、重农轻商观念、排斥科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反知主义、行政权力的支配作用乃至家族宗法观念、闭关锁国的排外主义等等。植根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从根本上排拒这些观念，甚至不能免除这些观念对自身肌体的侵袭。启蒙使命之所以成为未竟之业，这恐怕方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更具体地考察一下，在中国农村与城市，在中国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在文化的精微层面与大众层面或雅文化与俗文化等不同层面，启蒙与救亡、启蒙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实际关系，比之目前论者所作的一些概括要远为复杂。以城乡区别论，如果在

乡村中救亡与启蒙、战争与启蒙常常产生冲突,那么,在城市中,救亡与启蒙、战争与启蒙则更多地表现为互相促进。以地域论,面向海洋的东南地区启蒙思潮可以说是不绝如缕,而在内陆腹地,许多地方甚至完全没有受到启蒙思潮的浸淫。以社会阶级与阶层论,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近代型知识分子,通常对启蒙有着较高的热忱,但是,小农社会的传统习气常常使所有这些社会力量也不能置身其外,因为中国的士兵固然常常是穿了军装的农民,中国的工人也常常是穿了工装的农民,农民一旦取得了土地、权力、地位和财富,就可能成为地主或官员,中国社会各阶层几乎都与农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至于不同的文化层面,雅文化中启蒙成分居多,但也不乏因循传统的成分,俗文化中传统成分居多,但也不乏启蒙的熏染,启蒙与反启蒙也不是平安共处,它们既不断较量,又互相渗透。凡此种种,使我们有理由也完全有必要考虑,从反映中国传统小农社会近代蜕变的复杂运动出发建立研究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更为科学的架构,以便更准确地从总体上不是单线条地,也不是平面地,而是立体地了解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全貌。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新进展

十年来,民国思想文化史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量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类型,一是平反与翻案类,二是填补空白和开拓新课题、新领域类,三是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利用新的资料对各课题进行新的研究类。十年的研究大体上也可按照这三类划为三个阶段,当然,彼此之间又互有交叉。

个案研究的这种新进展,首先突出地表现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纷纷提出了为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所遭受的诬陷平反昭雪的问题。在突破了继续保持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的“两个凡是”精神枷锁以后，人们对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过贡献的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向警予、彭湃、邓中夏、赵世炎、方志敏、李立三、张闻天以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陈云等都分别编辑文集、选集、文选，展开专门研究。《李大钊文集》新版，较旧版增加了一倍篇幅。《瞿秋白文集》原先只收集了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方面的著述，现在政治与理论方面的著述正在整理出版，使瞿秋白思想研究有了比较完整可靠的文献资料。陈独秀的著作在经历了许多艰难之后，现在已有了林茂生等编的《陈独秀文章选编》及任建树等编的《陈独秀文集》，虽非全璧，但比之于散失于各方，研究毕竟方便多了。《蔡和森文集》也有两种，恽代英、张太雷、向警予、彭湃、邓中夏等人的文集各一种，目前能收罗到的著作大体上都已编入。许多选集的编辑出版，公布了不少从未刊行过的著述或讲话、演说纪录稿，虽有一部分在整理时作了一些删节与修改，但总的说来，对于有关专题的研究无疑是个很大的推动。本人或他人日记的刊布，回忆录的出版，纪念文集的发行，对于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提供了若干方便，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究的新课题。一大批年谱、传记、思想研究专著的撰写与问世，与这一基础是分不开的。在所有这些人物思想的研究中，李大钊、瞿秋白思想的研究比较成熟，张静如等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编写组编纂的《李大钊年谱》，韩一德等编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丁景唐等编的《瞿秋白研究文选》等，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陈独秀思想研究也有明显进展，同李大钊、瞿秋白思想研究一样，不回避矛盾，而力图对许多矛盾的言论行为作出解释，但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尚未问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成了这些年来人们力图比较客观地加以清理与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

的传播》，林代昭等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人文献的编译出版，向青等所进行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研究，使读者对直接影响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共产国际的认识，开始摆脱了原先朦胧甚至神秘的状态。中共中央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各个省区地方党组织文献的汇集、整理与公开出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运用的情形有了比之过去远为丰富与充实的文献依据。这一切，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资料条件。

徐义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开端》，综合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过程，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酝酿和制定、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方针的酝酿、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利用敌人营垒里的矛盾、在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前蔡和森“以暴动对付暴动”的策略方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等八章，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探索尝试。惜其后各个时期尚少这样的综合研究。当然，单个问题的研究为数还是不少的，也有相当深度；各根据地史的专著也都程度不等地接触了这一课题。这类研究有利于比较具体而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应用的实际状况。

这几年，出版了相当一批论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哲学思想与军事思想的专门著作。总论性的著作有郑德荣等的两卷本《毛泽东思想史稿》、张佑等的《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史略》；哲学方面有林青山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简论》、杨焕章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雍涛等《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刘梦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这同一个书名的，就有杨晓森等、雍涛等、赵永茂等好几种；军事思想方面有尚金锁等《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刘化锦《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等。还有为数不少的各类论文

集。所有这些著作，偏重于系统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及毛泽东本人的卓越贡献，各有一定价值，但内容雷同者也不少。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及发展的历史，已经引起了思想文化史研究工作者的注意，研究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毋庸讳言，研究还不够深入，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许多研究表现出缺乏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要求的理论勇气和严格的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有一篇《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提出应当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却一开始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的主客观原因，应当研究他们在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是如何可能的。李泽厚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选择的主要是阶级斗争学说，这固然是救国这一现实急需所驱使，更因为中国传统的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理性文化心理结构以及集体（国家）意识，易于同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具有社会发展理论与未来世界理想并肯定普遍规律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认同。李泽厚还强调指出，在中国小生产传统社会里，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与伦理主义因素、实用主义因素对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判断、接受、运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深刻地反射出了在象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命运。李泽厚所阐述的结论人们可以不接受，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人们却不能拒绝思考与回答。他试图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从现象的整列引向深层结构的分析，这一努力是应当肯定的。

近代以来，中国首次从传统的一元化的小农社会发展演变而为一个二元化的社会，一个城市与乡村二元化、沿海与内地二元

化、南部与北部二元化、同新兴工商业及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阶层与广大农民二元化的社会。许多志士仁人都曾作了努力，试图使它们相互连结起来。由于双方的力量并非势均力敌。在传统的阶级矛盾与民族危机迅速激化的过程中，曾一度力图掌握主导权位的城市、沿海、南部、知识阶层不得不转而附属于乡村、内地、北部及广大农民，从属于席卷中国大地的以土地重新分配为中心的现代农民战争。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代命运时，不能离开这一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的基本构造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趋向。

近代中国社会的二元化或多元性的结构及其运动趋向，决定了尽管没有成熟的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先行理论，中国却迅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选择时，在建党、建政等等问题上，又主要不是发端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主张，以及具有专制主义色彩的斯大林主义，综合了这两方面内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是终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几十遍、成百遍、逐章、逐节、逐段、逐句的学习，取代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各国杰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系统探究。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二元性及传统社会的压倒性优势，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自在与自为程度，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结构的延续与生命力，决定了中国在接受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时，所重视的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的创造，而是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支配作用以及生产资料占有与产品分配的均衡化，与此相应，同传统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农民被视为最为可靠的同盟军，而同现代生产方式及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反倒被视为异己的力量。

真理是具体的。毛泽东晚年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历史，可以了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真理确实了解得并不十分

具体，我们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或半传统的方式而不是马克思本人所采取的方式去掌握真理，这就使我们在近代中国社会二元化的总运动中常常陷入被动的状态，不自觉地压制了历史的前进运动。中国今天需要继续启蒙，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传播、新的选择及新的运用。中国的新启蒙不是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需要从传统的并从俄国民粹主义、沙皇专制主义的影响中得到了强化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中跳出来，通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科学得到更为广泛而切实的传播，得到更大的发展。这应当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一项光荣使命。

三 新儒家运动与西方化思潮 —— 两个新研究热点

新儒家运动与西方化思潮，这是近些年来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两个新热点。

新儒家这一名称，出现于五十年代后期，流行于六十至七十年代。1957年张君勱在纽约出版了一部英文著作，书名《新儒家思想的发展》，将宋明理学称作新儒家，以与先秦儒家相区别。但这一名称流行以后，已主要用于指所谓当代新儒学。李泽厚《略论现代新儒家》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但是，对这一概括，研究者并不都同意。这具体表现在人们在选择新儒家代表人物时，意见就相当不一致。1982年10月台湾《中国论坛》“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座谈会与专刊，以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勱、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钱穆为新儒家主要代表。李泽厚认为，真正的既具有代表性又恰好构成相连接的层

面或阶段的，应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人。钱穆、徐复观基本上是历史学家，张君勱、唐君毅虽属哲学家，但创获不多。刘述先于《知识分子》1985年秋季号发表的《当代新儒家的探索》则以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四人代表。美国学者卡罗特·傅诺斯在他所主编的197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变革的限制》一书及他本人所撰写的《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一文中，将新儒家视为将儒家思想现代化的运动，并认为，这一运动应溯源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将孔子神格化和将儒学建构为一个宗教思想系统，二十世纪初章太炎及其追随者将孔子看做一个理性主义的学者及社会道德家。该书所收录的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确认新儒家产生的真正标志，是1958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勱在香港《民主评论》杂志上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们宣布在儒家思想里中国文化具有超越文化本性的普遍价值与现代意义，而宋明儒学的伦理精神则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精髓。据此，张灏将这一运动上溯至康有为、梁漱溟、熊十力与冯友兰。据以上这些意见，新儒家运动大体上可以视为清末民初以来试图通过西方哲学、西方思想的吸收与改造使儒学具有现代生命或现代化的努力。按照这一涵义，与冯友兰同时而努力倡导新心学的贺麟，与熊十力同时而努力倡导程朱与陆王调谐的马一浮，则不应被冷落。甚至连力图使孔学三民主义化的戴季陶也可列为其中一个支派。

西方化思潮与新儒家最大的分歧，是认为既然要在物质层次及制度层次上效法西方，走现代化的道路，那末，在观念及精神层次上，也就不能不同样效法西方，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自由观念及科学精神。他们不同意儒学现代化的做法，认为儒学，无论先秦儒学还是宋明儒学，其根本思想与民主自由及科学精神是截然对立的。这一思潮清末的最著名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及孙中山等一批革命党人，民国以来的代表人物有从美国及欧洲留学归来的胡

适等一大批学者。他们所持的观点，通常被概括为“全盘西化论”。

先前，对于新儒家及西化派代表人物的研究，多偏重于从政治上揭露他们所持观点的反动性及荒谬性。五十年代中期批判胡适思想、梁漱溟思想及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便是这类研究最典型的代表。对于民国以来这两派几次重大的思想论战，如新文化运动中的东西文化论战，二十年代玄学与科学论战，三十年代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论战，等等，研究者常常笼统地归结为半封建文化与半殖民性文化的内部冲突，或唯心主义营垒内部的斗争。这一状况近些年来有了很大改变。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著作重新出版，1985年在黄州召开的熊十力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在北京召开的梁漱溟思想学术讨论会，便是这一改变的明显标志。

对于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思想研究。六十、七十年代，熊十力著作陆续在台湾重版，在台、港与海外学者中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特别是熊氏弟子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发表了一大批宣传性、纪念性的文章，将熊十力的哲学推尊为超过先儒与同时代其他各哲学家。这些文章以龙泉出版社出版的《熊十力先生纪念文集》所汇集的最为典型。从学术上对熊氏思想作了较为深邃研究的当数陈荣捷与杜维明。陈荣捷的《现代中国宗教之趋势》及《中国哲学资料》，首先将熊十力思想介绍给西方，并对熊十力的哲学作了精审的诠释。杜维明作为熊十力的再传弟子，在《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等论文中，从近代中国文化演化的总趋势及儒学命运等角度，给熊十力哲学以非常高的评价。在日本，也有一些学者对熊十力思想怀有浓厚兴趣。国内学术界到八十年代方才打破了长期缄默，开始对熊氏思想展开研究。汤一介、肖篱夫等组织整理《熊十力论著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郭齐勇在参加搜集整理熊氏遗著过程中访问了一大批熊氏亲友弟子，撰写了《熊十力及

其哲学》，表现了敢于攻难的勇气。他所编制的《熊十力年表》，尚嫌过于简略，日本学者已作了修订增补，发表于日刊。但总的来看，国内研究还比较粗浅。

关于梁漱溟思想研究，以哈佛大学教授艾恺所著《儒学殿军 梁漱溟和现代中国的困境》最有份量。这部由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精心之作，根据梁氏本人的著作及对梁氏乡村建设工作的同事、学生和梁氏有过接触的政界、学界人物的访问资料，讨论了梁漱溟在文化、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主要思想。作者认为，中国历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价值是否能适合于现代化，这是梁氏一生的主要问题。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是试图使中国既能取得现代化之利，又能保有传统价值的精髓。作者没有简单地将这种文化的保守主义斥为反动与落伍，相反，强调梁漱溟将蒋介石和袁世凯归为一类，而将他自己和毛泽东归为一类，认定国民党政治上不能成功，而共产主义则适合于中国的真正需要，因而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保持了密切关系。作者根据这一矛盾现象，着重分析了当现代化过程为外铄所致时，落后地区反应中所出现的集体认同的危机，将梁漱溟所代表的思潮同德国的浪漫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伊斯兰运动、泛亚细亚主义等等作了比较。对照这部著作，国内学者对梁漱溟思想新的研究便显得不足。台湾方面视梁漱溟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这限制了台湾学者研究的客观性；我们长期视梁漱溟为封建文化维护者，近年来虽然已经改变，但还没有来得及作更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问答录》，自述学术历程，很有参考价值，可惜的是，听说因为有所顾忌，公开出版的文本较原稿约少三分之一内容。深盼早日得窥全貌。

关于冯友兰思想的研究，可能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冯友兰自撰的学术与思想传记《三松堂自序》。其书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编共十一章，对他的生活经历、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了比较客观而真实的叙述，很有参考价值。遗憾的是，系统地